

溥儒与民初宗社党

——国博馆藏《溥儒致升允信札·驰念方深》研究

林 硕

内容摘要:民国初年,以溥伟、升允为首的宗社党频繁制造事端,企图以武力复辟清朝统治。溥儒作为溥伟的二弟、升允的女婿,徒以“旧王孙”的身份泼墨丹青,醉心书艺,对政治鲜有涉及。由于缺乏相关史料,学界始终无法判断溥儒对民初宗社党及其复辟活动所持的态度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封溥儒致升允信札,将信札内容与民国初年一系列历史事件进行对比,可知该信写于丁巳(1917)复辟失败之后,是旧王孙寄给岳父的劝慰信。溥儒信札的字里行间,无不流露出对升允投身复辟活动的钦佩与鼓励,据此可以推断他对民初宗社党持同情态度。

关键词:溥儒 升允 宗社党 丁巳复辟

爱新觉罗·溥儒(1896—1963),字心畲,以字行。恭忠亲王奕䜣之孙,载滢之子。一生笔耕不辍,诗、词、文、曲均有涉猎,著有《西山集》、《寒玉堂诗》、《凝碧馀音词》、《寒玉堂文集》、《华林云叶》和《寒玉堂岔曲》等作品。近年来,两岸付梓刊印的溥儒著作集不在少数,尤以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《溥儒集》^①收录较全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通溥儒写给升允^②的信札,共二十行,凡三百一十七字(其中正文十四行,二百四十五字;附录六行,七十二字)。信纸两页,横15.5厘米,纵25.5厘米,均为山水图案笺纸。首頁花笺印有“水阁清话,仿石谷子大意”、“中华”字样(图见封二)。末页笺纸印有“古木寒鸦,仿营丘法”、“中华”字样(图见封二)。该笺纸为上海中华书局印制,图案分别仿清代王翚和宋代李成的风格。信札正文首句为“驰念方深”,故将此文献称为《溥儒致升允信札·驰念方

^①溥儒:《溥儒集》,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,2015年。收入溥氏《西山集》、《寒玉堂诗》、《凝碧馀音词》、《寒玉堂文集》、《寒玉堂画论》、《寒玉堂书论》、《华林云叶》和《寒玉堂岔曲》以及《溥心畲先生自述》等。

^②升允,蒙古镶黄旗人,多罗特氏,字吉甫。清末,长期主政西北,官至陕甘总督(1905年)。

深》。查阅新版《溥儒集》，发现国博馆藏札的正文和附录诗文均未收入其中，实为沧海遗珠。且此文献内容涉及民国初年的复辟运动，可藉以分析溥儒对升允及宗社党持何种态度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故特撰文首次向学界公布。

一、溥儒与民初宗社党之渊源

奕訢次子载滢育有四子，溥伟、溥儒、溥佑、溥憲；其中溥伟承袭了亲王爵位，世人以小恭王称之。晚清以降，溥儒家族三代世受皇恩。洎宣统逊位，小恭王溥伟心有不甘，毁家纾难，抵押王府，联合肃忠亲王善耆、前陕甘总督^①升允组建宗社党^②，志在复辟。1917年6月，为了巩固宗社党各头目间的联盟，在兄长溥伟的安排下，溥儒在青岛与宗社党干将升允的女儿罗清媛^③结为伉俪。尽管是一桩政治婚姻，但溥儒和妻子婚后鹣鲽情深，与岳父升允和妻兄罗叔炳的关系亦甚为融洽，信函往来频繁。溥儒的家庭，乃至他的婚姻，都与民初宗社党的复辟活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：长兄是宗社党领袖，岳丈是复辟干将，婚姻是党内头目间政治联姻的产物。那么，身陷其中的溥儒，究竟如何看待民国初年这股复辟浪潮呢？实际上，他从未公开谈及对宗社党的看法。当时的历史背景、家庭环境也不允许他发表相关言论。特别是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大哥溥伟从大连前往沈阳，谋求与日本人合作；三弟溥憲^④也离开北平，前往满洲。恭王一脉的三位后胤，两人置身伪政权，不禁让世人关注、揣测溥二爷会不会步兄弟后尘？严峻的形式迫使溥儒写下《臣篇》，表达对溥仪、溥伟等人“作嫔异门，为鬼他族”^⑤的不齿，借此表明心迹，断不会出仕伪朝。正是基于这段过往经历，终溥儒一生都甚少言及政治，对于复辟话题更是讳莫如深。唯有通过他和复辟派^⑥岳父通信的字里行间，我们才能分析出溥儒对宗社党持何种态度。

①实际上，升允所担任的最后职务并非陕甘总督，而是署理陕西巡抚，督办陕西军务（1911年）。

②历史上，宗社党曾两度组建。第一次是清末，溥伟、善耆等人组建，其目的在于抗拒共和，实行君主立宪，后解散。第二次则是民国初年，溥伟、升允、善耆和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在日本的支持下重组宗社党，旨在复辟清朝。尽管二者在成员构成上有所重叠，却不可混淆。笔者认为，可称后者为“民初宗社党”，以示区别。为行文简洁，如无特殊说明，本文所提“宗社党”均指“民初宗社党”。

③升允的子女以“多罗特”的“罗”为姓，故其女姓罗，名淑嘉，字清媛，以字行于世，称罗清媛。

④爱新觉罗·溥憲，字叔明，满洲镶蓝旗人，本排行第四。因三哥溥佑出继安郡王一脉，因此溥憲便成为溥儒的三弟。1934年，溥憲一度前往“满洲国”，但并未出任任何职务，不久离开。与长兄溥伟一心复辟不同，溥憲前往满洲的动因，学界尚存在争论。

⑤溥儒：《寒玉堂文集·臣篇》，《溥儒集》，第558页。

⑥相对于宗社党，复辟派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。除溥伟、升允为首的宗社党外，晚清遗老康有为、陈宝琛、郑孝胥、刘廷琛、沈曾植、章梫等人均属复辟阵营。上述势力既相互勾结，却又互不统属。

二、《溥儒致升允信札·驰念方深》系年考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《溥儒致升允信札·驰念方深》的内容，为探寻溥儒对民初宗社党持何种态度提供了史料支持。现将全文抄录如下（图见封二）：

岳父大人钧鉴 敬肃者：

驰念方深，忽闻返旆，感且惊也。伏思圣人谨身立志之学，背乎理者守之易，近于情者操之难。故砺节砥行之士，养其气而不变，坚其守而不移，虽临大节而不可夺。极至诚之本性，守一心之良知，无声无息，心不违仁，庶几近于道矣。方今之世，礼乐之废久矣，而能守志不违、仁至义尽者，舍大人其谁求之？至于峥嵘志节、大义凛然者，人之所知也；其未来之事业，人之所不知也。伏望守其所知，勉其所不知。婿之敢望于大人者，此而已矣。岩谷寒庐，亦能笠屨相寻否？海风吹暑，尚祈珍重贵体。谨肃，敬请金安！

婿溥儒谨稟。

秋怀一律，录呈诲正

溪云木叶景凄然，落日萧疏古戍边。淡淡蒹葭秦苑水，离离禾黍汉宫烟。
相思尘海浑无梦，冷落枝花已隔年。万里秋空何所寄，星河耿耿夜孤悬。

由于信札无信封，落款亦无日期，需要结合溥儒、升允二人的活动轨迹考证系年。

第一，信札写作的时间上限。信札台头为“岳父大人”、“敬肃者”，表明此时溥儒与升允之间已是翁婿关系。溥儒迎娶罗清媛为妻是在1917年夏五月。据此可知，写信的时间上限被锁定在1917年公历6月之后。

第二，信札写作的时间下限。按照溥儒自己的说法，他于1918年八月自青岛出航，赴德国柏林研究院学习，历时三年半；毕业后获得博士学位，于1922年归国^①。显然，这通《溥儒致升允信札·驰念方深》并非写自异国他乡。故可以排除1918年八月至1922年这一时段。同时，在溥儒走后的第三年1921年，升允身患风疾，衰病侵寻，纵然他“养其气而不变，坚其守而不移”，也很难“大义凛然”地继续从事复辟活动。待到旧王孙1922年归国，升允早已远离复辟派的大本营青岛，偃旗息鼓，寓居津门。综合上述材料可以推断，此信写作的时间下限在1918年八月溥儒出国之前。

第三，信札写作的季节和收信地点。文末有“海风吹暑”一句，为我们提供了时间、空间双重线索。从时间上看，《礼记·月令》中有“(季夏之月)土润溽暑，大雨时行”^②的记载。同时，宋代淳于震先也有“六月海风吹溽暑，瓜田白酒

①溥儒：《溥心畲先生学历自述》，《溥儒集》，第887页。

②卫湜：《礼记集说》卷四十二，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经解本，第18页。

稔清香”^①的诗句。所以，此信当写于某年夏季，即阴历六月，公历7月。从空间上看，既然有“海风”，则收信人必然身在沿海地区。参照《升允复辟活动简表》（表1），只有大连、青岛、上海三座城市符合条件。而同时满足夏季、沿海，且处于1917年6月至1918年8月之间的时段，唯有1917年和1918年两个夏天，升允恰巧都在青岛。

时间	升允主要活动地点
1912年上半年	平凉、兰州、西宁
1912年下半年	湟源、湟中、阿拉善
1913年	库伦(外蒙古)、西伯利亚(沙俄)、日本东京
1914年	日本东京
1915年至1916年5月	日本东京
1916年5月起	青岛、济南、大连
1917年上半年	上海、日本东京、徐州、青岛、天津、济南
1917年下半年	青岛、上海
1918年上半年	河州等地
1918年下半年	青岛、长春
1919年至1921年	青岛
1922年	天津

表1 升允从事复辟的主要活动地点列表(1912年至1922年间)^②

第四，信札写作的具体时间。溥儒在信中鼓励、安慰岳父“极至诚之本性，守一心之良知”，徐图再起。结合1917年至1918年间的历史事实，笔者认为这是指升允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挫折——“丁巳复辟”失败。1917年夏，以升允为首的宗社党纠集各派遗老组成复辟势力，支持军阀张勋入京，拥戴溥仪复辟帝制。然而，日本政府就是否支持宣统复位这一问题，与军方产生严重分歧，最终的结果是对清室复辟暂时不予支持。探知这一消息的升允甚为沮丧，难以向宗社党成员及其他派系交代。日方的临阵变卦，加之各派复辟势力彼此间离心离德，各地军阀作壁上观，凡此种种令升允深感张勋的胜算极其渺茫，遂

①淳于震先：《忆故乡·三首》之一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：《全宋诗》(第四册)卷二二九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2694页。

②本表的编订主要参考升允于民国初年所写的密札十九通(刘锋辑：《升允复辟阴谋》，《近代史资料》总35号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147—158页)，以及溥儒撰写的《清授光禄大夫前陕甘总督大学士多罗特文忠公神道碑》(《溥儒集》，第539—543页)。

匆匆“返旆”，龟缩在青岛寓所数月之久^①。因此，1917年丁巳复辟前后的史实，与《溥儒致升允信札·驰念方深》劝慰、鼓励的基调完全吻合。然而，升允的复辟活动并未就此偃旗息鼓。次年，他又携四名随从经水路前往西北腹地，会见了马福祥等一众旧友。尽管复辟密谋始终未能实现，但故友相逢，把酒言欢，升允的情绪尚可，并不符合《溥儒致升允信札·驰念方深》所阐释的落寞心境。是故，此信写于1918年夏季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。至此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：《溥儒致升允信札·驰念方深》的写作时间大致是在1917年夏季，丁巳复辟失败之后不久。

三、溥儒眼中的民初宗社党

溥儒在1917年夏季写给岳父的这封信札，可谓用心良苦。是年，对于立志复辟清朝的升允、张勋等人而言，可谓先喜后悲。喜的是：年初升允亲赴日本，得到寺内内阁默许宣统复辟的承诺。得知这一消息的各路复辟分子欣喜若狂，以为可以倚仗日本为靠山，举兵入京，拥戴溥仪坐享大清的万代江山。然而，日本政府的最终目的是，借助复辟派的力量赶走积极向英、美等国靠拢的总统黎元洪。这与1916年，大隈内阁利用宗社党在大连和呼伦贝尔组织勤王军^②，借此逼袁世凯下台的手段如出一辙。不明就里的张勋率三千^③“辫子军”入都，拥护溥仪再登九五，改纪年为“宣统九年”。日方见目的既已达成，转而支持亲日派。7月初，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的段祺瑞在马厂誓师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北京，为自己博得了“三造共和”之美誉。丁巳年这场闹剧遂匆匆收场，复辟暗潮自此一蹶不振。

作为女婿，溥儒深知丁巳复辟的失败对升允的打击颇为沉重。自1916年，

①关于升允中道折返青岛的原因，除本文所述“日本政府变卦说”、“复辟派系矛盾说”之外，还有其他几种说法。如溥儒《清授光禄大夫前陕甘总督大学士多罗特文忠公神道碑》中提及升允临都而还之事，使用了“未几变作，道阻不得赴”的说法（《溥儒集》，第542页），认为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升允进京。又如《郑孝胥日记》的记载，升允是因为张勋“宗旨忽变”，愤而南返（郑孝胥著，劳祖德整理：《郑孝胥日记》第三册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1668页）。照此说法，升允是主观上自动离开。但张勋“宗旨忽变”确指何事，尚无定论。

②日方对巴布扎布武装的称呼为“蒙古军”（西原龟三：《在满蒙地区的蒙古军及宗社党与日本军及日本人的关系》，转引自《近代史资料》总35号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168页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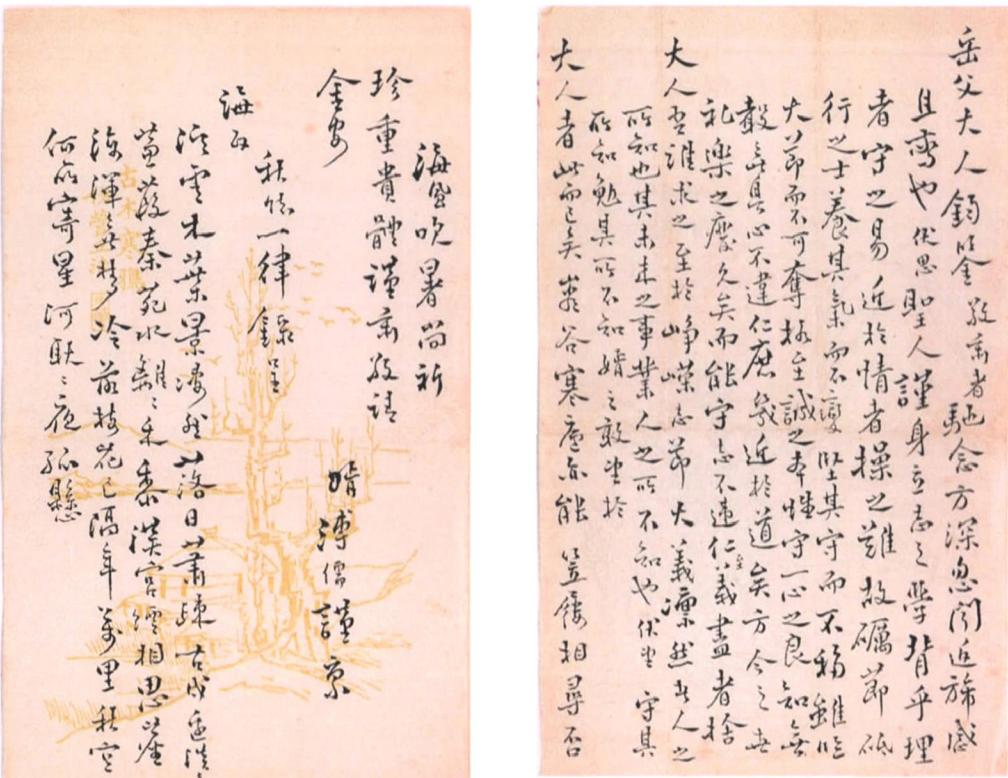
③关于张勋进京所带部队数量，有“三千”、“五千”两个版本。《字林报》的特别访问员曾于1917年7月13日，对张勋进行了访谈。根据张的自述——“我有兵三千，当与敌军五万相抗”（转引自郑孝胥著，劳祖德整理：《郑孝胥日记》第三册，第1673页），本文采用“三千”说。《字林报》，又称《字林西报》（*North China Daily News*），由英国人创办，是民国时期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。

巴布扎布战死林西，勤王军大部溃散^①，宗社党丧失了自己的武装力量。升允奔走呼号，将仅有的希望寄托在对清室尚怀效忠之心、剃发留辫的张勋身上。岂料张勋麾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，一触即溃，连他本人也乘坐汽车冲出重围，仓惶窜入荷兰使馆寻求庇护。丁巳复辟的结果彻底打碎了升允的多年筹谋，致使其浊气郁结于胸，终日长吁短叹。因此，纵览《溥儒致升允信札·驰念方深》的字里行间，一方面透露出溥儒对老泰山的劝慰之情，鼓励升允养气不变，坚守不移，尽管屡经挫折，仍要保有百折不挠的信念。另一方面，在谈到人生事业时，溥儒认为“其未来之事业，人之所不知也”，希望岳丈大人可以“守其所知，勉其所不知”。而升允追求的事业是什么？人所共知，就是复辟清王朝。因此，溥儒言下之意是：复辟之举，成敗利钝，但尽人事，唯听天命。甚至在“婿之敢望于大人者，此而已矣”之后，紧接着写道“岩谷寒庐，亦能笠屨相寻否？”由于缺少主语，此句可作两种解读。其一，在寒冷的山谷之中，（谁）又能否头戴斗笠、脚踩草鞋找到您呢？其二，在寒冷的山谷之中，（吾）又能否头戴斗笠、脚踩草鞋追寻您呢？倘若是按第二种解读，那溥儒对升允和对宗社党的感情，恐怕绝不是同情那么简单。此外，文末附录的七言诗当中，有“淡淡蒹葭秦苑水，离离禾黍汉宫烟”、“万里秋空何所寄，星河耿耿夜孤悬”之句，仿佛让人听到一丝前朝遗老哀鸣之声。

综上所述，《溥儒致升允信札·驰念方深》写于1917年，丁巳复辟失败之后，是旧王孙写给身在青岛的岳父——宗社党干将升允的信函。溥儒在信中并未对岳父从事复辟活动进行任何苛责、规劝；所表达的仅仅是对升允投身宗社党复辟事业的赞许，鼓励他面对挫折隐忍蛰伏，守志不渝。这通手札传递出一种对复辟失败深感惋惜、悲悯与遗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。这种情绪可能并不仅仅针对升允个人遭遇，而是对于整个民国初年宗社党复辟活动的真实情感表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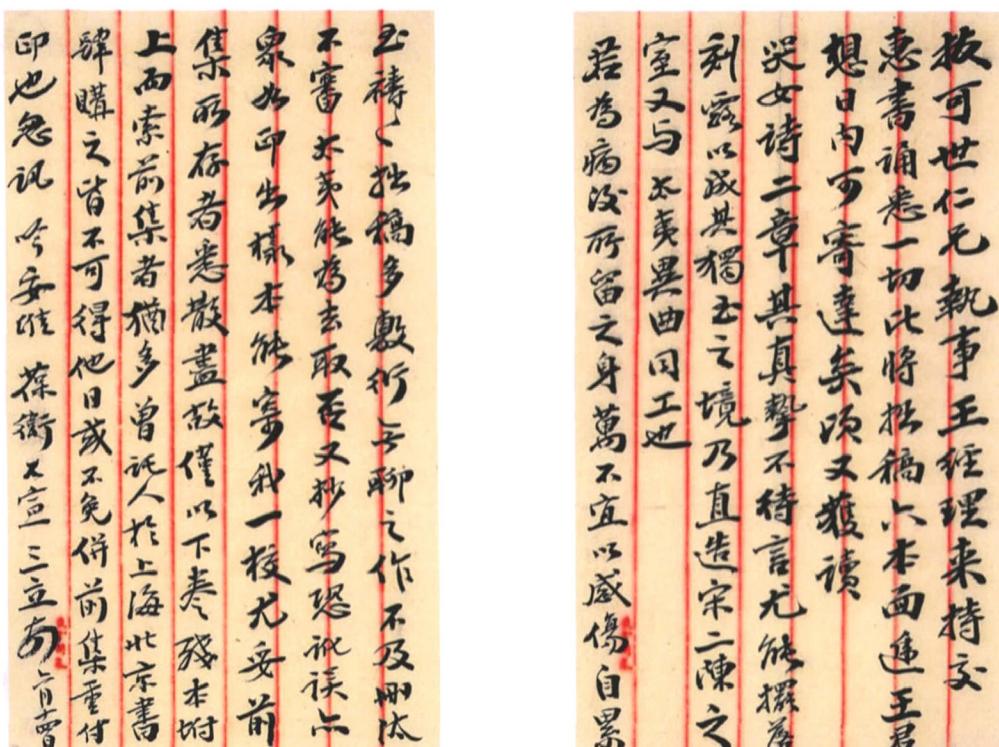
【作者简介】林硕，史学硕士，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。研究方向：晚清民国文献。

^①林西之战后，巴布扎布的武装部分溃散，余部退至喀尔喀流域，对呼伦贝尔等地进行袭扰。至1917年秋，被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联合俄军击溃，残部被黑龙江督军招抚。见详（日）柏原孝久、滨田纯一共著：《蒙古地志（上卷）》，富山房，1919年，第1561页。



溥儒致升允信札

详参林硕《溥儒与民初宗社党——国博馆藏〈溥儒致升允信札·驰念方深〉研究》一文



陈三立致李宣龚信札

详参吴建伟《陈三立致李宣龚、曹经沅函札简释》一文